

● 农伟雄

胡适和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ABSTRACT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un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U. S.) has a collection of 100 thousand Chinese ancient books of medicin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mong which 40% are rare-books. In July, 1950 Hu Shih held the post of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and from July, 1952, he had served as the honorary director. 15 refs.

SUBJECT TERMS Hu Shih — Deeds and achievements Gest Oriental Library — History

CLASS NUMBER G258.83

图书和图书馆,同任何一位学者的事业都是紧密相连的。我国著名学者胡适曾说过,他的学术成就一点也离不开图书和图书馆。而以下我要论述的,则要证明胡适的一生不但依赖于图书和图书馆,他也曾实际负责过图书馆的工作。

20年代初,胡适担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时,曾联络10几位名教授搞了一次预约集资,从琉璃厂的索古书店高价购回一部《金瓶梅》(明万历年刻本,系现存的最早刻本),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因该馆财力不足,无力采购入藏)^[1]。胡适主张,珍善本古籍应入藏国家图书馆,以便保存传世。1926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平成立,胡适出席了成立大会,被选为第一届董事会常务理事,任期3年^[2]。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国立北平图书馆1936年南迁上海法租界的102大箱甲级善本紧急转藏美国,以胡适之名义保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3]。抗战期间,胡适在美国多次参与征集活动,将世界各国捐赠中国的

图书资料寄回国内。战后,国民政府曾拨出专款收购失散的珍善本,以补充著名学府及国立图书馆的馆藏,并成立了由胡适、袁同礼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全面开展收集工作^[4]。

以上也许是荣誉性和临时性的任务兼而有之,而胡适一生中真正和一个图书馆的整体工作有直接联系并起主导作用,应从1950年7月1日算起。他当时住在美国纽约,应普林斯敦大学校长陶德之邀,应聘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之职。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中小型图书馆。因为胡适曾任驻美大使,同时又是世界级的学术名人,对此当时舆论很不理解。但胡适却很看重这个职务,自赞为“文化大使”。

1 一所世界上唯一的中国 医药古籍图书馆

对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国学者知道的甚少。1962年,台湾的一位学者亲临之后

便惊呼：“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听说过，海外有这么一个特殊性质的图书馆，将中国古代医、药古籍集中一起，蔚然成为全世界唯一完整的中国医学图书馆。……从此我的陋漏寡闻，使我不但大开眼界，同时也受到了不小冲击。”这位学者不但著文介绍，还动员自己在美经商的儿子两次去这个圣殿，以目睹“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5]。

这便是学者心目中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20年代初，一位美国建筑工程师葛思德来到北平，他在热闹的天桥买到了一瓶河北定州（即今正定）产的眼药水，按照医嘱滴用一个星期之后，他那多年延请西方名医诊治而未愈的严重眼疾便神奇般消失了。这件事使葛思德对中国的眼药水感激不尽，并产生了向世界推广中国医学的想法。

葛思德给他的朋友义里寿（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留下一笔钱，委托他收集中国医、药学古籍及民间各种诊方偏方（尤其是眼科）^[6]。历来的中国收藏家，他们看重是宋元刻本或名家刻本，对于民间及殿本（即宫本）大多不以为然。所以义里寿的搜购工作进展顺利，仅一年时间，他便购得中国医、药图书600多种3500多册，大多是民间罕见的刻本、手抄本，也有诸如《本草纲目》这些巨著。涉及了病理、药理、针灸、相面、麻醉、生理等学科资料。

随着对中国古籍版本目录知识的提高，义里寿的搜购工作在医、药古籍之外又扩展到其他门类。其中也有不少是珍贵的宋元刻本。如1923年他在北京北郊一个寺院里买到的一部《大北寺经》，全书5348册，其中就有700册为宋版，1700册为元版，这套书便是1931年国人在西安市郊一个庙中发现的罕见的那一部碛沙本《大藏经》残本的另一部，不过《大北寺经》却比《大藏经》多出11册，宋、元版本则多出500册。明刻本是义里寿收购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我国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先生曾赞扬说：“葛思德

收藏中的许多明版书，恐怕连义里寿本人也不知道是全世界仅有的书籍”^[7]。至于清刻本，乾隆皇帝下令刻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本，据我国著名的藏书家陶湘披露：“这套丛书的单本书倒经常发现，可是整套丛书的原版书却极难寻觅，仅到最近，收藏家缪荃荪（1844~1919）经过一生寻觅，终于寻得了原刻本138种一套。”而缪氏收藏的这一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后来竟被义里寿所购得。此外，他又不知从哪里购得了此套丛书原版书的另外3套^[8]。至1928年，义里寿购得中国珍善本古籍约2000种10余万册。

1928年秋，义里寿将这些中医、中药和大量的其他中国古籍寄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Montreal）的麦克吉尔大学图书馆，正式开办了“葛思德中国研究图书馆”。这样，由一小瓶正定眼药水引发的一个以中国医药古籍资料为特色的汉学图书馆便在西方诞生了。葛思德推广中国医药学的志向终成现实。

从一瓶眼药水到一个汉学图书馆的诞生，葛思德的“灵感”实际上挽救、保存了中国一批珍贵文物。40年代初，当这批中国古籍从加拿大再转入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图书馆之后，王重民先生曾被邀请来作鉴定。王氏只看了葛思德全部收藏的三分之一便认为：“在我所审查过的中国图书馆的收藏中，我认为葛思德收藏是最重要的收藏之一。我曾在国会图书馆审查过1500个图书项目，又曾把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战时存放于美国的27000个图书项目加以审查，我已经发现葛思德收藏的A部分（历史、文学）百分之七十，和国会图书馆或北平图书馆并未重复，D部分（文集）有百分之五十不重复”^[9]。

王重民先生当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部工作，由于早年他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也在善本部做同样的工作，所以他对中国珍善本古籍在国内外的存在情形的看法是具有权威性的。抗战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存放于美国

国会图书馆那部分古籍是中国古籍精华之所在,所以在“七七”抗战爆发前便紧急南迁,然后又迁往美国,而王氏仅在葛思德收藏的三分之一中便发现其A部的百分之七十和D部的百分之五十同国立北平图书馆那部分“寄存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那1500个图书项目并不重复。换句话说,葛思德收藏中的许多珍善本是国立北平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没有的。从这位著名的版本目录学专家的评语中,便足以证明葛思德这部分收藏极其重要的价值了。

2 胡适同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最初联系

1938年,葛思德为使这部分中国古籍发挥更广的作用,有意将全部馆藏捐给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图书馆。“普大”校长陶德首先想到是,必须对这批中国古籍提出鉴定,然后再决定是否接受。于是他邀请他的朋友胡适(当时任中国驻美大使)做这项工作,帮助作出“最终裁决”。

这便是胡适最早同葛思德图书馆的接触。当接过目录一一核对之后,胡适发现这是一个“很有用”、藏量丰富的“古董书库”。其中有不少他早想看而无法看到的珍善本。如上面提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原书,胡适知道世上仅存5套,其中1套藏故宫博物院,另外两套被日本帝国主义掠走,而他手边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竟有2套。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的初版本,1908年曾被一个外国人译成英文,流传国外,胡适多年寻找初版本而未遇,而葛思德收藏中竟有完整的一本。对于该收藏中的宋、元、明历代佛经古籍,胡适纠正了义里寿著录中的某些注释。至于众多的医学、药学古籍,胡适并非内行,但他知道包括中国在内,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收藏家专门统一收集过,形成这么齐全的规模。因此,这部分收藏也

是世界上极宝贵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胡适建议陶德应该接受葛思德的捐赠。

1943年以后,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在美继续研究《水经注》,从此他便成为该图书馆的忠诚读者。为了搞清乾隆皇帝赞扬《水经注》作者戴震(1721~1777)时所写的一首诗的日期,他曾在美国的几个著名的汉学图书馆(包括国会图书馆)查过,但都没有找到乾隆皇帝完整的诗集。在国内一些著名的图书馆也一样。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胡适认为“这是由于乾隆诗作太差,因而中国的编目者和美国的汉学图书馆都不屑收藏”。而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却收有这位皇帝的全部诗作,共459卷,24200余首。另外在1944年,胡适发现了赵一清(1691~1764)《水经注释》的手抄本,共20册,根据考证,胡适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直接从手稿本上抄录下来的抄本”。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这两件收藏解决了胡适《水经注》研究中多年未解决的难题。

关于同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上述联系,50年代初,胡适曾写过《我早期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关系》一文,他说从1943年至1946年这三年时间内,他经常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以及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借阅有关《水经注》研究方面的资料,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图书馆的负责人南西·史温曾给他许多方便,让他借一些珍善本带回纽约校阅。这使胡适对这个图书馆有进一步了解,他认为在这10余万册中国古籍中,至少有百分之四十(即4万册)可以称作一般意义上的藏书家的珍藏——即最早和最精美的印刷的善本书和手稿,以及最古和最佳版本的历史、宗教、哲学等门类的参考书。

陶德在最终接受了胡适的建议的同时,还以聘请胡适为第一任馆长为条件。但由于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胡适匆忙回国而没有实现。

3 胡适应聘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1948年12月的最后几天,胡适匆匆离开北平东厂胡同1号的住宅,登上蒋氏派来的专机而到了南京,并于1949年4月由上海乘船去美国,住进了纽约81街104号公寓。闲居1年之后,于1950年7月1日正式应聘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之职^[10]。

胡适的这次谋职,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生活所迫,但主要是他对于这些馆藏古籍的向往,而在“普大”校长陶德的推举之下促成的。可能是由于这种关系,本应任职之日便填写的个人履历表格材料,直到10月11日他才填写,前后晚了3个月。现存于“普大”图书馆的这份表格是胡适亲自填写的。“学位”栏中填写:“学士,康奈尔大学,1914;博士,哥伦比亚大学,1917”;还包括了普林斯敦大学在内的32个荣誉学位。“经历”栏内填写:“中国哲学教授,北京大学,1917—37;文学院院长,1932至1937;校长,北京大学,1946—49……”。

由于胡适填写个人简历表晚了3个月,便造成他的工资支票发不出来。为此“普大”图书馆总馆副馆长在7月24日与8月19日两次给总馆长写信,说“胡适的薪水支票发不出去,因为他没有将表格交进来。”^[11]8月15日总馆长秘书即给胡适去信说明情况,并附去表格,要他填写好马上回邮,以便以后正常汇出薪水支票。这些都能佐证胡适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任职的“坎坷经历”。

胡适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工作主要是督导性的。他每周到馆工作两个半天,筹划妥了之后,馆务交由其助手童世纲先生负责。不过他对该图书馆的贡献是具体的,“普大”社会学系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李马援教授为此专门写了一份报告,认为胡适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胡选用童世纲(武昌文华图专毕业)

作为助手,童氏熟悉图书馆管理业务,对中国古籍图书也很内行,是图书馆的行家,这样便顺利解决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大量的中国古籍的科学管理的问题。

二,胡和童氏检查了图书馆的全部馆藏,并形成了馆藏古籍的一份详报。该图书馆珍善本包括:1232~1272年的宋刻本700册;1297~1322年的元刻本1700册;1368~1644年的明刻本24500册;历代手抄本3000册(其中1602年前的抄本2150册);1728年的木刻活字印本5020册;两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1412册;殿本二十四史7850册;清初版本、殿本善本、宋、元、明善本重印本(1644~1920年)2000册;蒙文佛经(1772~1790年)109册;历代医、药古籍3500册。胡适还用英文写了一本《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收藏》的馆藏介绍书籍,并为特别珍贵的古籍写了近5万字的说明文字。

三,在胡的督导下,童世纲对全馆各类图书重新安排,制定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国古籍图书分类法”。对每一部古籍类分,排架,使一般人都能利用。

四,胡利用丰富的馆藏古籍多次举办书展,他本人亲临现场,介绍版本及内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作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委员会委员,李马援教授在研究报告的结论部分认为:普林斯敦大学图书馆以及中国问题研究者都程度不同地受惠于胡博士的辛勤工作和智慧。而校长陶德却引用了一位图书馆学家的话说:一个好的图书馆可以办一个著名的研究所或大学,而一个研究所或大学则必须用上几十年,才能办好一个图书馆。“胡博士在普林斯敦大学主持了‘一个伟大的图书馆’”^[12]。

然而,胡适任职到1952年7月1日,便被“普大”图书馆总馆所终止。这个决定似乎不是原来双方商定的日期,是1951年12月11日总馆会议在讨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问题时单方作出决定的。其原因是“为了节省开

支”,所以决定擢升工资较低的童世纲先生为馆长(年薪 3480 美元),而终止同胡适的聘约(胡氏年薪为 5200 美元)。这个决定后来报请陶德校长并得到批准。为了执行决定又要顾全作为世界名人及对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有实际贡献的胡适,由陶德校长具名写给胡氏的“解聘”信的措词极为客气,信中逐条重申了李马援先生研究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贡献,然后指出:“我深沉感到遗憾,由于学校的经济状况,使我无法继续请你担任葛思德图书馆馆长的职务”^[13]。这封信之后,接着又发出一封邀请信,正式邀请胡适做“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终身荣誉馆长”。

胡适收到信后,心中当然感到很不平衡。但没有因为对方的突然决定而提出异议。直到半年之后,即 1952 年 12 月底,当他回到台北参加北大同学会时才慷慨陈词,说寄居异国,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由此可看出他的心境。然而尽管如此,1952 年 5 月 1 日,他仍以理解、感激的语气回了一封信,这封用英文写的信大致如下:

亲爱的陶德校长:

我非常感谢你 4 月 28 日的那封来信,你在信中情词恳切,……我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做的一些工作——真是太少了,你们却用这样热情的方式来表达谢意。这让我非常感动。……我以诚恳感激的心情接受你的邀请。诚如我在最近一封信中告诉你的,我将继续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及普林斯敦大学略尽绵力。

胡 适

1952 年 5 月 1 日^[15]

胡适接受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荣誉馆长的职务,并且一直保持到 1962 年逝世。1951

年 7 月 1 日,当他离开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时,他握着童世纲的手感慨地说:“你至少要在这里待上 10 年,才会有成功的希望,你将来就是一位文化大使”。这也是胡适从事两年图书馆实际工作之后的体验吧。那么在他看来,办好这个中小型汉学图书馆,实实在在地作出贡献,并非一年二年之功;所以他才特别嘱咐自己的继任者“至少要在这里待上 10 年”。由此可看出胡适对图书馆事业的想法及他自己的工作态度。此后,胡适再没有回过葛思德图书馆。人们为了纪念这位馆长,这位“文化大使”,至今,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仍挂着他的照片,书橱中仍摆放着他当年题签的多种赠书。

参考文献

- 1 胡颂平. 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 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78:72
- 2 严文郁. 中国图书馆发展史. 台北:枫城出版社,1982:213
- 3 同上:136
- 4 中国图书馆协会会报. 1947,21(2):16
- 5 陈纪滢. 胡适、童世纲与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台湾传记文学 27(1):6~7
- 6 同上:8~9
- 7 同 5:14~15
- 8 同 5:11
- 9 同 5:88~89
- 10 周质平. 何止是悲凉而已. 台北:中央日报,1994. 2. 18
- 11~15 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图书馆档案抄件

农伟雄 1966 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本科毕业。现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员,中国史学会理事。已发文 30 余篇,主要论文有《论清末民初我国图书馆文化》等。通讯地址: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邮编 100006。

(来稿时间:1994-05-11。编发者:刘喜申。)